

惨死的母亲还抱着哺乳的婴儿。从许多位母亲的尸体旁也躺着死孩子的情形看起来，母亲总想保住可怜的小生命，以自己的身子挡护着孩子，母亲死了，羔羊似的婴儿也死在鬼子的血手里。”

这次大惨案，潘家峪有1237名平民惨遭杀害，一千一百多间房屋被烧毁，全村有31户被杀绝，所有的财物被抢掠一空。

（摘自《河北文史资料》）

潘家戴庄惨案

潘家戴庄千人坑

田益廷 刘作云 王树增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6月9日上午8点30分在沈阳市开庭审判8名日本战争罪犯。日本陆军第一一七师团长铃木启久在法庭上供认：“1942年十月二十八日（农历），为推行‘三光政策’，我下令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彻底‘肃正’潘家戴庄，集体屠杀千余和平居民，烧毁民房一千余间，把财物抢劫一空……”“我杀害中国人民的手段是残忍的，毫无人性的，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忘记的，我诚恳地接受中国政府对我的正义判决……”

潘家戴庄现属河北省滦南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冀东八路军北宁路南（下简称路南）游击区中的一个拥有371户、1765口人的大村。北距张各庄8公里，南距倭城8公里，是倭（城）、张（各庄）公路的必经之处。1942年12月5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驻张各庄、司各庄的日伪军250余人，在日本骑兵队长铃木信指挥下，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千人坑”大惨案。屠杀我同胞1128人，烧毁民房1030间，财物被抢掠一空，美丽富饶的村庄变成了一片焦土。杀人现场惨不忍睹，30户被杀绝，31户只剩下孤儿寡母。惨案至今虽已过去40多年，但对日本侵略者欠下中国人民的这笔血债，人们是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

—

1942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冀东推行所谓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规定自12月2日至8日期间，配合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本次“治安强化运动”达到最高潮。

日寇先是以北为重点，沿长城各县制造“无人区”，驱赶路南地区16岁至60岁的男人去路北挖沟筑垒。尔后，在路南挖“遮断壕”，搞“清水摸鱼”。日寇伪军驾着大板车大肆抓捕男性青壮年去做劳工，违者枪决、刀砍或被就地活埋。对于没有“良民证”的外乡客商、走亲访友和赶集上店的农民，则视为“通共”、“通八路”分子，枪挑、刀砍于“杀人坑”并下令不准收尸，收尸者也以通共治罪。

为了配合路南地区群众的抗日活动，八路军迁（安）滦（县）卢（龙）县基干队大队长张鹤鸣率二连、新三连和地方游击队一部，挺进路南，经常活动于唐官营、川林和潘家戴庄一带，寻隙打击敌人。12月4日下午4点时分，当我部队由唐官营

——潘家戴庄——向程庄转移时，日寇派出一个骑毛驴的密探，尾随在我部队的后边，探清我部队的人员、装备后，从潘家戴庄赶回张各庄据点。晚饭前我部队刚到程庄，准备在该村宿营，伪保长程殿栋同伪办事员程为平、徐俊3人溜进倭城据点，将程庄驻有八路军的情报呈递给倭城伪警察分局长王星寿。王星寿这个汉奸，为献媚请赏，马上通电他的主子——驻张各庄日本骑兵队队长铃木信。在此之前，负责在冀东执行五次治强的日军第二十七步兵团少将兵团长铃木启久（他后升为第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曾指令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迅来对该村（指八路军活动的村庄）进行‘剔抉’，彻底消灭该地的祸根”。所以，铃木信得知王星寿和密探的情报后，如获至宝。当夜就调集张各庄、司各庄两处日寇、特务、伪警备队250余人，深夜12点出发，在柱王庄会合后，直扑程庄去执行“剔抉”计划。

迁滦卢基干队在得知程庄伪保长程殿栋逃跑的消息后，即刻撤离该村，午夜12点，从店子村迁回到潘家戴庄。天将拂晓，从村西传来了稀疏的马蹄声，隐隐约约的人影也凝眸可见。我隐蔽在村西高坎、岭地上的哨兵，断定是敌人摸上来了，即刻朝敌人射出一阵排子枪。走在前面的两个鬼子尖兵，应着枪声栽下马来，一个当即毙命，一个捂着中弹伤口嚎叫不止。一心想到程庄围歼“土八路”、稳操胜券的铃木信，万万没有想到会在潘家戴庄挨打，他不知所措，慌忙拨马败逃。特务和伪警备队也有如丧家之犬，尾随其主子掉头西窜，失魂落魄的鬼子、特务逃至皂户村，按兵未动，伺机反扑，被吓得胆战心惊的伪警备队，趴在潘家戴庄村西的沙岗下边，等待“皇军”命令。

我初战获胜的迁滦卢基干队，为保存实力，决定暂时避开敌人的锋芒，迅速转移。部队行动前，怕老百姓身遭不测，动员他们一同转移。村东头的几家群众随着转移出去了，但多数

群众未及转走。他们哪里知道一场浩劫就要降到他们的头上！

二

12月5日天亮后，鬼子派出的密探回报：“八路已经跑了。”铃木信惊魂稍定，转而声嘶力竭地喝令部下，重新整队，杀回潘家戴庄。把村庄包围后，鬼子、特务们端枪、持棒，挨门挨户喝令男女老少，统统到村东南角的大场里听“皇军”讲说。慢者棍棒打，违者杀头！少数群众早饭刚进半餐，多数群众还在空腹饿肚，就被豺狼野兽赶出家门。全村老老少少，不管盲人、残废还是病人都被驱赶到“会场”，所谓会场就是杀人场。东、北两面的房子上站满了端着刺刀的伪警备队，场南的围墙上和路口中间，还架着几挺机枪，鬼子和特务头目们，齐聚“会场”中央，他们是：

铃木信（日本驻张各庄骑兵队长）、郭成信（日本骑兵队翻译官）、张占鳌（张各庄伪清乡办事处主任）、间岛（日本驻伪清乡办事处顾问）、安田（日本驻张各庄骑兵小队长）、曾广昭（伪清乡自卫队队长）、牛田（日本驻张各庄骑兵小队长）、程凌阁（驻司各庄的伪警备队小队长）、杨××（驻司各庄日本骑兵队翻译）。

铃木信面对群众虎视眈眈，阵阵狂笑；特务爪牙横眉立目，提着棍棒，端着步枪，围着群众荡来荡去。场上的百姓们预感到一场大祸就要临头。

9点时分，心狠手毒的鬼子、特务，从人群中第一个抓出了教师马文焕，厉声问道：“八路的有多少？都往哪里去了？”马文焕刚说出“不知道！”一群特务蜂拥而上，朝他一阵乱棒，打得他遍体鳞伤，鲜血淋漓。最后，一个特务对准马文焕的脑袋狠狠一棒，立刻殷红的血浆从耳朵里喷了出来，惨死在血泊中。

几个鬼子、特务盯着喷血的耳朵，跺脚狂笑。接着，一个特务又从人群中拽出齐盘成，先用凶狠的目光扫视一遍人群，然后回过头来，大声喝道：“要不说出八路军的下落，同样下场！”未等齐盘成回话，就被打死在地上。此刻，一个鬼子又从人群中拉出青年李庆发，随后扒走他的棉袄，另外4个鬼子端着刺刀，对着他的前胸后背，连声逼问：“八路军的哪里去了？”李庆发回答“不知道！”鬼子再次逼问，李庆发还是回答“不知道！”这时，豺狼成性的日本强盗，一刺刀扎在李庆发的肚子上，热血喷了一地，肠子流出肚外，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潘恩田，因躲避鬼子藏在自家的慢子上，被特务发觉后，赶进杀人场。他刚走进人群，就被鬼子、特务抓出来，先是一阵乱棒，后又扎了他一刺刀。潘死后1小时，鬼子特务又杀了他的母亲，活埋了他的妻子、妹妹，摔死了他那刚满4岁的儿子。时近中午，鬼子、特务按照铃木信的指令，窜入人群，一起抓出了李忠海、潘恩和、戴运成、戈振久等19名群众，他们都先后惨死在刀枪棍棒之下：有的七窍出血，有的脑浆四溢，有的被砍掉头颅。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泄露八路军的机密和领导者的姓名。

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特务，一看问不出八路军的去向，便从人群中挑选出二十多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用枪逼着他们将地主潘俊章的场北挡车霸道的老沟，加深加宽，挖成了一条长10丈，宽7丈，深6尺的大坑。大坑挖好后，鬼子、特务从挖坑人手中夺过锹、镐，驱赶群众进坑。群众面对死亡，挣扎外闯。敌人手持刀枪、棍棒，开始了血腥大屠杀。在人群里棒起刀落、锹镐乱舞，善良的百姓成片成片地倒下去。万恶的鬼子、特务，把打死打伤的人们，扯着双腿扔进大坑，然后纵火焚烧。周树全誓死不进杀人坑，被鬼子一镐刨死在坑沿上。戴昌田被鬼子推进坑里后，他奋力争着往外爬，又被鬼子一镐砸碎了脑袋。周

树清刚从坑里爬出，又被两个特务扔进火堆。周树恩被敌人打掉脖子，左腿上挨了一刺刀，数小时后，活过来了，他忍着剧痛，从死人堆里爬了起来，逃出了虎口。

时过正午，敌人用过午饭，又把杀人魔爪扑向妇女。开始，敌人用刺刀、棍棒、锹镐驱赶妇女进坑。特务汤兴辉等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们，嫌妇女进坑太慢，他们就用绳子拉、扁担赶。大坑里堆满了死人和活人。鬼子、特务逼着挖坑的人又挖了一个长20丈，宽1.5丈，深1丈多的大方坑。齐安居的妻子，从坑里往外爬，一个鬼子朝她狠狠就是一刺刀，刀尖透过前胸，躺在了血泊中。她的两个女孩子，一个叫菊勾，一个叫白勾，见到妈妈被敌人扎死了，趴在母亲身上放声大哭，万恶的日寇又用刺刀把两个孩子挑进坑中。周树昌的妻子正顺着坑沿往上爬，被鬼子一刺刀挑开肚子，立刻肠胃落地，胎婴流出。

在大肆屠杀妇女之前，鬼子、特务轮奸了年轻的妇女之后，将她们拖回杀人场，枪挑、活埋了。

孩子的妈妈们，只知道自己的惨死，哪里知道她们的亲生骨肉比自己死得更惨！这些丧尽天良的强盗们，把嗷嗷待哺的孩子们抓起来就往大坑里扔，或顺手一刀砍掉脑袋，或一脚踢进火坑。特务张占鳌是个杀人成性的刽子手。他凶狠地拎着孩子们的小腿往碌碡上摔，被摔得脑浆四溅，血肉横飞。一群特务也学着他的招术杀人，30多名天真活泼的幼童被活活摔死在碌碡上。

这群吃人的豺狼，一心要把潘家戴庄斩尽杀绝，最后把30多名挖坑的青年枪挑、锹铲于杀人坑。

血洗之后，250多名鬼子、特务从杀人场窜回村里，他们先砸门落锁，翻箱倒柜，抢劫财物，后纵火烧房。顿时，火光冲天，浓烟蔽日。熊熊大火一直燃烧了3天3夜。第二天正遇西北

大风，柴草木灰随风飘出三十多里。潘家戴庄变成一片焦土。

日寇血洗、凶杀潘家戴庄的野蛮暴行，很快传遍铁路以南各地。各村群众遥望着大火，焦虑不安，愤恨不已；与潘家戴庄有亲属关系的人们，无不牵肠挂肚，甚至失声痛哭；虎口余生的人们，特别是趁给敌人抱草，而逃出杀人场的学生们，虽得到乡亲们热情照料，但因思念亲人，而终日哭泣不止。被日寇征去路北（杏山、干河草和长城一线）挖战沟、服劳役的150多名青壮年，听到自己的家乡被烧、亲人被杀，心急如焚，他们扔掉铁镐，闯过敌人的数道哨卡，甩掉敌人的追击，星夜跑回潘家戴庄。去他乡走访亲友的潘恩普老大爷回村后，一见全家（9口）亲人被杀，房子被烧，立刻昏倒在地。他想亲人想疯了，一连几昼夜不离杀人场，呼天唤地，哭儿叫女。后来，他疯癫愈甚，离开人世。

在抗日政府的关怀、组织、发动下，活下来的潘家戴庄人，三四天后陆续回村，附近村庄的群众和亲友也都先后赶来。第五天头上开始收殓亲人尸体。众亲人一进杀人场，悲痛欲绝，声泪俱下，哭声震天，十里以外，怆然可闻。

人们滚动着泪水，从坑里往外挖亲人，可是大坑里被烧杀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血肉模糊，尸骨凌乱，缺脚断臂，手足成灰，额烂头焦。孩子们的小小身躯，已经蜷缩一团。被埋在大坑最上层的人们，已被野犬撕得残缺不全。“千人坑”里惨状奇凄。齐广礼被烧得全身焦黑，腿已成灰。戴文秀的闺女，是被鬼子头朝下活埋的，双脚烧焦，眼和舌头全被挤压出来。六十多名孕妇肚子被烧崩，或被压开，胎要流出体外。

掘尸的人尽管小心慎重，但是，拉胳膊，胳膊断；拽腿，腿掉下来。无奈，用绳子拴在死者腰上往上拽，把掘出来的尸体摆了一场。亲属们凭带血的“良民证”、领袖不全的衣裤或生理

特征来辨认亲人。最后，有200多具尸体，实在无法辨认，只好合葬于一个肉丘坟。

三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我迁滦卢联合县三总区区长蔡永为、助理吴兴洲、白虹（陈风）赶到潘家戴庄，观察了惨案现场，并向殉难同胞肃穆默哀，告慰惨死的父老姐妹们，我们一定向敌人讨还这笔血债！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在十几天以后的一个夜间，蔡永为、吴兴洲、白虹和染各庄小学教员潘化民（潘家戴庄人）等一行6人，又来到潘家戴庄，在一间教室里召开了幸免于难的群众会。蔡永为让潘化民宣读了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亲笔写给潘家戴庄人民的慰问信，信中写道：

……听到潘家戴庄人民惨遭日寇杀害，心里万分悲痛。日寇的暴行，极为令人发指，活着的潘家戴庄人民，要有骨气，不要因此而倒下去。要效仿路北地区的潘家峪人民，组织起复仇团，为惨遭杀害的同胞报仇。全冀东的八路军做你们的后盾。今派人送去步枪6支，手枪1支，武装起来，向敌人讨还血债！

不久，我冀东抗日政府先后2次给潘家戴庄送来了2车玉米、3车种子、12头骡马和大批土布等物，以支援惨案后人民的生产、生活。鼓励他们要团结一致，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打击日寇，重建家园。

日寇集体屠杀潘家戴庄居民的根本目的，在于镇压铁路沿线人民，顺利推行其“沟壕堡垒”政策，扑灭抗日烽火，确保北宁铁路的安全。但却适得其反。用战犯铃木启久的话说，“由于潘家戴庄事件，附近一带居民尽向他方避难，所以骑兵队负责修筑的壕沟，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完成。……不但壕沟没有完

成，而且‘最平稳’的‘治安区’的铁路以南地区有数百名八路军出现，并逼近北宁铁路线。”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潘家戴庄人，并没有被日寇的野蛮屠杀吓倒，他们怀着满腔怒火，庄严宣誓：“誓死为亲人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惨案发生后的一个月，即1943年1月，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复仇团”，小顺更名“齐心”，二义改名“报仇”。他们二人当天晚上同戴仲全一起报名，第一批参加了“复仇团”。从“复仇团”建立到日寇投降前，潘家戴庄又有30名青壮年参加了地方游击队和八路军路南地区主力部队——一区队，走上抗日第一线。

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给潘家戴庄人报仇，在惨案后月余，一区队调集第一、第二连，分别埋伏在崔新庄和北夏庄一带。早6点时分，司各庄据点之敌，大摇大摆地走进我埋伏圈。瞬间，机枪、步枪响成一片，杀声震天，敌人死的死、亡的亡。屠杀潘家戴庄人民的刽子手、怙恶不悛的汉奸杨翻译和日本探长都被我当场击毙。

我抗日政府为了给潘家戴庄人民报仇雪恨，惨案发生不久，就逮捕、处决了给日寇送情报的汉奸程殿栋。解放后，在镇反和肃反运动中，又把参与惨案暴行的特务、汉奸曾广昭、张占鳌、汤光辉、杨广洲、马荣钦、张殿臣、侯福喜等二十多名反革命分子逮捕归案。党和政府依据他们的罪恶，分别将他们判处了死刑、死缓 and 徒刑。

1956年6月，在沈阳公开审判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战犯。当年潘家戴庄惨案中虎口余生的周树恩，应我国特别军事法庭的邀请出庭作证，控诉日寇暴行。当周树恩在法庭上敞开衣襟，露出块块伤疤时，这个当年不可一世的“皇军”师团长，吓得面如土色，跪下认罪。按照国际公法，铃木启久被我国特别军事

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消息传到潘家戴庄，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摘自《唐山文史资料》第四辑）

血债累累的张占鳌

杨海桥

编者按：本文所揭露的张占鳌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汉奸特务。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残酷地推行“三光政策”时，他参与制造了河北省滦县潘家戴庄活埋无辜群众1283人的大惨案，他作恶多端，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解放后张占鳌潜逃到黑龙江省龙江县，在“镇反”中漏网，在“肃反”中被查获归案，就地正法。

张占鳌的罪恶史和他在“肃反”中被查获的经过，曾在北京1958年的“肃反的伟大胜利”展览中展出，并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其主要内容还被载入《时事手册》。

张占鳌一案是由黑龙江省公安厅、龙江县公安局、龙江县肃反五人领导小组联合调查，共同努力查获的，共历时3年，耗资上万元。

本文就是在访问了当时的主要办案人，现龙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波同志之后，又查阅龙江县公安局、人民法院保存的两本张占鳌卷宗，综合整理而成的。它较详细地揭露了张占鳌的罪恶历史，记述了“肃反”时查获此案的经过。是一份较为翔实的史料。

梁耀华到底是什么人

1952年，我们党领导和发动了镇反运动。龙江县四区繁荣小学教员梁耀华，主动交待了自己的罪恶历史：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二区明庄子村，父梁建业。本人当过伪职员，曾勒款200元；又在乐亭一区甘草坨子乡先后在催款中贪污290元；在汤河乡小张庄催款时打了李乡丁两个嘴巴子；1947年在乐亭县甘草坨子参加国民党，介绍人是王存明、韩步清，现分别住长春、肇东，组长李树文，证人张文祥；以后又参加蒋匪甘草坨子救济委员会，任办事员，进行反动宣传，散发过传单，先后贪污救济物资：面袋50条，大衣18件，西服2件等。当时，由于是他主动交待的，又无力全面外调，就定为历史反革命，控制使用。后来，县公安局对凡是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进行调查，特别是对既不接来妻儿，又不回家探亲的梁耀华，尤其重视。从1954年起，派专人按照他的交代和他填写的干部履历表，进行了外调。但是，他所交待的那些地方无人认识他；他所交待的证明人，一个也查不到；他交代的罪行也无一属实。于是把他的情况报告给省公安厅，并呈送其全部卷宗。省公安厅拟定调查提纲，组成调查组，从1955年3月至10月两次进行调查，仍无一核实。如：调查人傅洪志报告：“在长春市通过公安局卡片室进行仔细查找，未有查到张文祥踪迹。”调查人雷云清报告：乐亭县并无国民党甘草坨子支部组织；县公安局掌握的国民党员中，也无韩步清、李树文等人；乐亭县也并无救济委员会组织，有个救济组，但组织档案中也无梁耀华；乐亭县也无小张庄，因此，打人之事也无法查对；拿梁耀华的照片到他所交待的出生地明庄子调查，无一人认识他。根据上述情况，省公安厅认为梁耀华有可能是假坦白，至少是未交待真实作恶地点。故将材

料退回龙江县公安局，并批示：“此人更名改姓，有重大历史问题。”把此案作为省重大案件之一。

梁耀华到底是什么人？根据党的八大提出的“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要求，于1956年开始了肃反运动。龙江县委五人领导小组，把调查梁耀华作为重点之一，委派当时的文教科科长梁波和刘连春同志，带上梁耀华的照片，拟定提纲，再次进行外调查证。但路线基本和前两次一致，所到之处，接待者都问：“你们怎么又来了？”经过10天查证无一收获。于是他们向乐亭县委组织部请求开一个“满天飞”介绍信，先到梁姓庄和姓梁多的庄子去调查，都无收获。后来，他俩决定到各乡电去开座谈会，出示照片，念梁耀华履历。他们到董各庄时，找6位老人开座谈会。会上先让大家传看照片，无人认识；再念简历和证明人，当念到东海村崔秉香时，有人说：“蒋各庄共同湾村有个崔秉祥。”任何一点线索，都使人高兴。第二天，二人直奔蒋各庄乡。韩乡长接待了他们，但拿出照片，他不认识；提到崔秉祥，他尽力在想。这时，团委书记苏广善进来，韩乡长问：“小苏，你认不认识照片上这个人？”苏广善同志看了足有四五分钟，最后，他眉头一皱说：“是张占鳌！”梁波只注意姓了，忙追问：“叫什么？”苏广善肯定地回答：“张占鳌！”又问：“他是干啥的？”回答：“他是特务！潘家戴庄惨案就是他干的！”这真是意外的收获。原来，苏广善同志和张占鳌于1948年在一起教过学，知道张占鳌的罪恶历史。后来梁、刘二同志来到滦县潘家戴庄，看了解放后新建的村庄和为死难者立的碑，还找到了几位惨案的幸存者，当群众听说张占鳌更名改姓潜伏在黑龙江省龙江县时，恨得咬牙切齿说：“抓他回来点天灯！”二同志又到滦县公安局抄录了有关潘家戴庄惨案材料，并向滦县县委做了汇报。县委决定：按政策，张占鳌一案应黑龙江处理。

张占鳌的罪恶

张占鳌，1921年生于河北省滦县倭城镇东八户庄，1940年5月到滦县第一警察分所当贴写，由于他一心充当日本侵略者的走狗，1943年便被县公署委任为二区张各庄清乡办事处组织组组长。在日本守备队长铃木和顾问间岛的直接领导下，大干搜集情报、清查和肃清八路军及与八路军有联系的人的罪恶勾当。1942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他与日寇一起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惨案。

是日晨，他带领办事处人员跟随日寇守备队从张各庄出发，奔向东南去清乡。天刚亮，到了潘家戴庄屯西，八路军从庄内开枪，打死日军一人两马，其他人马转头逃跑。跑到霍各庄，日军马队又返回，再到潘家戴庄时，我八路军已撤走。日军领队安田命令：集合群众。这时，身穿黑色警服、腰别匣枪、眼带墨镜的张占鳌，右手拎一根四尺来长、二寸多粗的木棒，带领办事处的人从屯西往屯东赶人，并挨户搜查。他领头从路南赶出四五名妇女，又到路北一家赶出3名妇女。妇女不愿走，他就口骂棒打。把老百姓都集中到屯东场院里。张占鳌先从人堆中找出五十多岁的齐攀成^①问：“八路军昨晚住在哪里？又哪儿去了？”回答：“不知道！”他飞起棒子就打。最后一棒子打在齐攀成左耳上，立刻倒地身亡。接着又打跪在一边的齐天成。齐天成回答：“实在不知道！”他挥棒又打，把齐天成打得满地乱滚，遍体鳞伤。这时妇女中张占鳌的姨姥喊：“赢协（张占鳌的乳名。生他时，正赶上他爷爷赌博赢了，故起此名）！那是我们家的人啊！”他的连姑辮头也喊：“张占鳌，那是我叔啊！”他住了手

^① 上文中为“齐盘成”，与本文中的“齐攀成”均系一人。

(后来借找铁锹挖埋人坑的机会，把齐天成带出放了，但不到一年齐就死了)。接着又挖起了埋人坑。当挖完二十多丈长，一丈多深，一丈多宽的大坑后，安田下令：“统统埋了！”张占鳌就命令办事处和自卫团的人往坑里赶男人。他挥舞棒子，边推边打，先把两个男人推进坑中，接着又有数不清的人被推进坑里，坑中人挤人，人压人，呼天喊地，真是惨不忍睹。边推边埋，埋完了，安田又下令抱柴草烧露在上边的人头。张占鳌就带人抱柴草往人头上扔，点火烧。往上拱的人，日寇用刺刀扎，张占鳌带人用木棒戳。埋完男人，已到午间，张占鳌向安田求情，先放出两块钱，又放出他连姑辮头，还跟出一个姑娘霍小丫。张占鳌把她们送进屯里，放走了辮头，把霍小丫领进一间屋里问道：“我把你救出来了，你愿意不愿意跟着我？”姑娘吓得直抖，不从。他竟凶狠地威胁说：“你不同意，我就把你带回去！”在他的淫威下，姑娘被奸污了。霍小丫不久含恨而死。下午，又挖了一个大坑，3点多钟，“呼”地开始埋女人和小孩。更是哭爹喊娘，万分悲惨。当剩下200多人时，一个妇女喊：“你们怎么不跑啊？左右也是个死！”妇女们一哄而散，把旁边的障子都挤倒了。但有日寇守备队设卡，哪里跑得出去？张占鳌带队往回圈人，木棒一齐挥打。他先撵上两个妇女，硬拉回，用棒子打进坑中；他又撵上一个抱小孩的妇女，那妇女跪下求饶，他恶狠狠地说：“不行！你不进坑也跑不了！”又用棒子把她打入坑中。那妇女把小孩放在坑沿上边，张占鳌抓起小孩的腿，狠攢在地上摔死，又扔入坑中。真是灭绝人性。傍晚埋完了1283人后，安田又下令烧房子。张占鳌带领办事处的人到处点火，他亲手把屯西一户三间正房和一个大草垛点着。整个潘家戴庄一片火海，几十里外都看见火光冲天。张占鳌这个效忠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汉奸特务，深知自己在家乡附近又有亲属

居住的潘家戴庄做恶多端、罪恶深重，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但是，他并不肯放下屠刀，而是继续为日寇效劳，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汉奸走狗的下场

1945年9月，滦县被国民党接收，将张占鳌逮捕，判了4年徒刑，押在唐山监狱。1948年10月12日，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唐山，他出了唐山监狱，跑到乐亭县东海村他祖父处，隐瞒罪恶历史，混入了教育队伍。1949年8月，当他闻讯滦县侨城公安局要抓他时，他逃往东北。先到沈阳又转锦州，连续几年避开了公安局的追捕。后又潜逃到碾子山他舅舅家，更名改姓为梁耀华，又混进教育队伍，并且以伪造的简历和假坦白，混过了镇反这一关。

肃反运动一开始，有关部门就把梁耀华控制起来了，采取的是内紧外松的策略。当梁波、刘连春二同志返回黑龙江后，县委五人领导小组责成梁波同志审理梁耀华。当开始审问他时，他仍故作镇静地重复他伪造的历史和罪恶。梁波同志突然问：“你姓什么？”梁耀华吃了一惊，冷汗立刻冒出来了。在步步紧逼的攻势下，他报出了真名“张占鳌”，承认参与了潘家戴庄惨案。但是，他又把自己打扮成随从者，把自己的罪恶全部推到另一名汉奸张玺华身上，妄图再次蒙混过关。还谎说他借抱柴草之机放出不少小学生，借做午饭之机放走几个妇女。但是在多份证言面前，他的伪装全部被剥掉，现出原形，不得已坦白交待了全部罪恶。1957年1月29日，张占鳌被逮捕归案。中央肃反五人领导小组调阅了张占鳌的审理卷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验印。1957年10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57年度刑复字第174号判决：“判处被告人张占鳌死刑，立即执行。”

龙江县召开了公审大会，将其押赴刑场，验明证身，就地正法。

（摘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十辑）